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0期(民國109年12月),111-15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鼎革前後的博奕與調適：1949年燕京大學的多重面相*

張德明**

摘　要

1949年間，隨著國共政權的鼎革，燕京大學校方、美國托事部與中共圍繞燕大的校務管理展開了博奕。當時燕大多數師生選擇留守北平，中共對燕大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提供一定的經濟援助，允許其繼續使用美國經費，使其教學秩序得以保持正常，並享有學術自由與宗教自由。以陸志韋、范天祥為代表的中外教職員還進行了管理學校的權力之爭，最終以新的校務委員會成立而使中方獲得實際控制權。燕大校內師生多數對國民黨統治失去希望，對中共充滿憧憬；也有師生採旁觀心態，認為學術與政治關係不大；校內傳教士與基督徒對於堅持無神論的中共仍然存有質疑，但也積極尋求與新時代融合。燕大在1949年出現的諸多新變化，充滿了主動與被動的多樣選擇，中共、美方與燕大根據形勢的不同適時地調適、磨合，其中存在許多波折，特別是中美雙方在經費、宗教問題上的矛盾，更為此後燕京大學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關鍵詞：燕京大學、陸志韋、美國托事部、基督教、中共

* 收稿日期：2019年1月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11月15日。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前　言

1949 年是國共政權更迭的重要年分，在華教會大學同時也面臨著抉擇。中共出於穩定中外關係大局考慮，對外國教會開辦的大學暫時實行維持現狀的政策。但維持現狀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教會大學師生對新政權接管後何去何從甚為關切。由於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無神論在理念上的直接矛盾，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下，教會大學如何管理？能否保證學術自由及宗教自由？是當時教會大學師生最為關注的問題，也是校方、中共及教會三方矛盾最為集中的問題。在 1949 年鼎革前後，由於三方對教會大學各有訴求，形成了微妙的博奕關係，同時校內也出現了諸多新變化，為教會大學最終的命運埋下了伏筆，這是政權更替過程呈現出的一個重要面相。而且在 1949 年接管城市初期，中共對教會大學的政策比較特殊，與建國後的政策有所不同。這些問題對深入探討 1949 年的中共與在華教會大學的關係，以及瞭解教會大學師生此時期的心路歷程變化，顯然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為此，本文將以燕京大學為例，利用北京大學檔案館與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所藏燕京大學檔案、在華基督教差會檔案、美國政府檔案、報刊、日記及回憶錄等中外文資料，揭示燕京大學在 1949 年新舊政權交替前後發生的變化。[1] 同時，本文將分析該校在此過程中的校務管理、經費、人事、師生態度變化等問題，並考察在此期間的校方、中共及美方的複雜關係，以期深化 1949 年教會大學本土化改造歷史的研究。

1 目前學界涉及 1949 年燕京大學研究的代表論著有：張偉瑛等編，《燕京大學史稿》（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9）；陳遠，《燕京大學（1919-195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楊奎松，〈一位美國傳教士在燕京大學的「解放」歲月——圍繞范天祥教授日記和書信而展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5 期，頁 30-52；張建梅，〈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燕京大學的接管與改造〉，《北京黨史》，2016 年第 2 期，頁 44-47，及其〈新中國成立前後燕京大學外籍教師的去留抉擇〉，《上海黨史與黨建》，2018 年 5 月號，頁 39-42 等。但上述論著皆非對 1949 年的燕京大學的個案研究，對 1949 年燕大各方面情況的論述也不足，在史實、資料方面仍需要補充挖掘。

一、三方博奕：燕大維持現狀的落實與調整

燕京大學（簡稱燕大）成立於 1919 年，為民國時期著名的教會大學，主要由美國北長老會、美以美會、公理會及英國倫敦會聯合開辦。抗戰勝利後，燕大的主要辦學經費由設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托事部（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簡稱美國托事部）統籌，[2]該部對其辦學也有一定的指導權。當時美國托事部、中共及燕大校方圍繞燕大的去留及人事、經費問題，從各自的利益出發展開了博奕，最終經過多方協調，使得燕大獲得了暫時維持現狀的局面。中共試圖加強對燕大的管理，以陸志韋（1894-1970）為首的中方教職員在盡力維護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舊傳統時，也多傾向中共，使得美國托事部及外國教員很多訴求無法實現，而中共的改革則在校內順利推行。

（一）燕大現狀的維持

1948 年 11 月底，隨著東北野戰軍、華北野戰軍聯合發起平津戰役，北平被逐漸包圍，燕大校內異常緊張，學校或走或留成為討論焦點。燕大代理校長陸志韋內心對中共存有好感，不主張根據美國托事部及燕大前校務長、當時為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的建議南遷，且遷移對師生不便，故主張留守北平，並呼籲師生支持。當時在燕大的近千名學生中，贊成南遷的不到 300 人，在燕大實行民主表決的情況下，遷校南下的提議未通過。[3]燕大多數教職員的意見也是繼續留在燕園辦學，希望燕大可以在不犧牲基督教目標或教學自由條件下，作為私立大學繼續運行，燕大校董會、美國托事部先後在 1948 年底同意了他們的建議。[4]最終，燕大同北大、清華等北平高校一樣選擇

---

2 該機構 1945 年 6 月底成立，也譯為「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

3 〈陸志韋不理司徒大使〉，《誠報》，1949 年 2 月 7 日，第 2 版。

4 Dwight W. Edwards,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 1959), pp. 420-421.

了留守，沒有遷到外地辦學。對於師生去留，燕大校方則是讓其自由選擇，並未施加壓力。到 1949 年 1 月初，基於北平戰事，燕大有近 200 名學生撤離北平，但還有 720 名學生與 95%的教職員在學校堅守。[5]燕大還在上海設立專門辦公室幫助南下的師生，待局勢穩定後，陸志韋曾致電留滬師生，歡迎他們重返燕園。

燕大決定留平後，由學生自治會出面，邀請校方參加，成立了應變委員會，並由學生組織護校糾察隊輪流巡查站崗，以保護學校安全，防止國民黨軍隊的破壞。[6]12 月中旬，國共軍隊在北平西郊激戰，位於西郊的燕大被迫在 12 月 13 日下午開始停課，校外居住的教職員、眷屬於 13 日下午集中到校內，食糧亦集中，並組織消防隊以防萬一。[7]到 12 月 15 日，中共軍隊完全控制西郊。12 月 16 日下午，陸志韋召集教職員宣布了中共接管西郊的消息，「他表示，在所涉及的宗教習慣上，期望我們能有徹底的自由，但他擔心在不久的將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基督教道德心的支配可能發生衝突。我們應當盡力全面合作並期待衝突得到解決。」[8]12 月 17 日，燕大正式復課，恢復正常教學。

中共對燕大的政策有較強的靈活性，並沒有直接接管。毛澤東早在 1948 年 12 月 15 日凌晨曾以中央軍委名義急電東北野戰軍領導及前線將領，要求通知部隊注意對燕大、清華的保護。[9]爲此，東北野戰軍十三兵團政治部在燕大校門口貼了保護燕大的布告，不准部隊擅自進入學校，干擾教學。燕大師生急於瞭解中共的政策，12 月 18 日，中共派十三兵團政治部所轄宣傳部部長呂炳安來校宣講，發表了展望燕大美好未來的鼓動性講話，與師生座談以解答各種

---

5 Lucy M. Burtt,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January 10, 1949, p. 1,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enching University (Hereafter, AUBCHEAYU), RG011-377-5736-0468, Yale Divinity Library.

6 張世龍，〈燕園破曉前〉，《在第二條戰線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頁 250。

7 〈清華燕京平靜〉，《大公報》（上海版），1948 年 12 月 15 日，第 1 版。

8 賴樸吾（Ralph Lapwood）著，晨鋒譯，〈一位外國人目睹的北平解放〉，《北京黨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頁 84。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卷下，頁 421。

疑問，並提出保證燕大繼續自由辦學，並盡可能給予幫助。[10]後經與中共關係比較密切的社會學系教授嚴景耀及燕大學生自治會的邀請，12 月 19 日十三兵團政治部主任劉道生又來燕大宣講當時的形勢與中共的各項政策，與師生員工進行座談。[11]此次講話消除了很多師生心中的疑慮，燕大教授林庚在概述劉道生講話要點時，稱中共「企圖組織人民共和國，並非蘇維埃制度。說話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像共產黨員口吻。共方政策已改變，適合國情，所要打倒者惟蔣政權及四大豪門。保護文化機關，公教人員，工農商各界。」[12]之後燕大與十三兵團還舉行聯歡和座談會，互相慰問，中共方面除了幫助恢復了中斷的供電，十三兵團的文工團還來燕大表演《楊勇立功》、《兄妹開荒》、《血淚仇》等文藝節目，宣傳中共政策，對燕大師生觸動很大。12 月 24 日，美國合眾社記者就燕大情況採訪陸志韋，陸氏稱中共軍隊迄未進入燕大，該校師生均許自由在城郊行動，外籍教授均安全，並能完全自由繼續講學。[13]因國共仍在北平交戰，爲避免燕大受到炮火攻擊，他還請記者向美國駐北平領事建議，由領事出面向國共雙方提議燕大爲中立區。[14]

除了軍隊與燕大的交往之外，1948 年 12 月 22 日，中共專門成立西郊工作團，安排成員張宗麟、魯歌專做清華、燕京的政治工作。12 月 26 日，團長榮高棠率領工作團到燕大作首次的正式訪問。[15]12 月 27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給平津前線將領的電報中還寫道：「燕京是司徒辦的學校，陸志韋當然和司

10 《范天祥日記（1948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23；Grace Boynton, "Yenching, from Old Order to the New," 《燕大文史資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輯 3，頁 220-221。

11 〈燕京、清華兩大學充滿新氣象〉，《人民日報》，1949 年 1 月 12 日，第 1 版；劉道生，〈清華園的美好回憶〉，《人民日報》，1985 年 12 月 4 日，第 4 版。在《燕京大學史稿》及部分燕大校友回憶錄中稱劉道生 12 月 17 日至燕大演講，但根據 1949 年 1 月 12 日《人民日報》的報導及 12 月 19 日的《范天祥日記》，可證明爲 12 月 19 日。

12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頁 240。

13 〈穿過火線探燕大，外記者報告稱情形正常〉，《申報》，1948 年 12 月 27 日，第 1 版。

14 "'Battle' at Peiping Relatively Quie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1948, p. 7.

15 〈北平市軍管會文管會關於接管清華、北大，維持燕大的專題報告（1949 年 4 月 1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頁 468。

徒有聯繫，但燕京教職員中左傾者不少，陸志韋態度亦較民主，我們應採保護政策。」[16]可見當時毛澤東對燕大持積極認可態度，這決定了此後中共對燕大的政策。當時中共一方面繼續由地下黨提供燕大各種有關情況，一方面訪問陸志韋、嚴景耀、雷潔瓊、翁獨健等所謂的進步教師，分別舉行座談會，並與講助教會及學生自治會保持經常的接觸。[17]中共對燕大的善待，美籍教師范天祥（Bliss M. Wiant）在 1949 年 1 月的信中說到：「共產黨安撫我們，聲稱他們有不得損害校園的特別指示。而他們確實對我們很客氣及關心，甚至借錢幫助我們度過這難關。」[18]

在新形勢下，美方對在華教會大學政策也成爲這些學校關心的焦點。美國托事部 1948 年 12 月起草發布〈對當前中國教會大學的政策聲明〉，提出決定繼續資助在華教會大學，但要求這些大學忠於基督教的原則與實踐，具體有三個條件：一是必須保持教會大學的行政權和人事權；二是必須容許教會大學有宗教自由；三是必須維持教會學校的學術研究自由。[19]實際上這三個條件，在 1949 年的燕大得到貫徹執行。1949 年 1 月 20 日，美國托事部執行秘書明思德（Robert J. Mcmullen）[20]還專門撰寫致中國教會大學朋友們的公開信，附於托事部主辦且在 1949 年 2 月出版的《中國大學》（*China Colleges*）雜誌中，鼓勵這些大學以積極的態度在變局中繼續辦學。[21]

根據形勢的變化，中共 1949 年對外國教會學校的政策，經歷了從容忍到改造，從緩和到激進的過程。[22]中共中央基於維持中外關係考慮，在 1949 年 1

16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修訂本）》，卷下，頁 427。

17　〈北平市軍管會文管會關於接管清華、北大維持燕大的專題報告（1949 年 4 月 1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上）》，頁 468。

18　轉引自范燕生（Allen Artz Wiant）著，李駿康譯，《穎調致中華：范天祥傳——一位美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頁 249。

19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 351。

20　此人還有另一譯名爲：麥默倫。

21　具體參見“R. J. Mcmullen Letter to Friend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 January 20, 1949, *China Colleges*, 16:3 (February 1949).

22　對此問題，可參見 Robert Bickers, *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2017); 邢福增，〈連根拔起：建國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的終結〉，《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增訂版）》（香

月 19 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對於外國人辦的學校特別指出：「已辦之私立外國學校，暫許其維持現狀，但其校長必須爲中國人；其學校經費，必須報告其來源；其課程，必須照其他學校的規章，同一辦理。」[23]這爲燕大的管理指明了方向。中共當時並未對燕大進行過度干涉，決定維持現狀，只要燕大不違背新政府法令及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即可正常辦學，同時幫助其解決經濟困難，並進行必要的改良。當時燕大與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下設的文化接管委員會（簡稱文管會）接觸較爲頻繁，經常向其諮詢校務方面的建議。陸志韋、嚴景耀、雷潔瓊等常來文管會，與錢俊瑞、張宗麟商量校務，如公開招生、將存在城內的麥粉、布匹運去學校等。[24]正是在中共維持現狀的政策下，燕大仍然可以接收美國的經費，保留西方教職員，當然這是中共基於緩和中美關係、穩定形勢作出的臨時政策。

對於燕大的情況，1949 年 2 月，美國公誼國際聯合會駐北平幹事在致該會報告中稱：燕大一切生活情形正常，北平中共軍隊的政治工作人員對於燕大校務未加以干涉，並對他們願意留下維持正當校務工作而不一走了之的精神，表示敬佩；中共當局表示極願與燕大的教職員共同合作，爲中國的高等教育而努力。[25]中共還注意及時向燕大師生解釋宣傳中共政策。如 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北平時，「在燕京門口戒嚴的戰士搞的很緊，一直進到女生宿舍的門口，限制學生出入，反動派即散布不滿，說蔣介石來時戒嚴士兵亦未進入燕京，毛主席是人民領袖爲什麼這樣，一些中間分子亦爲其迷惑，經

港：道風書社，2012），頁 153-216，及劉建平，《紅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基督教、天主教的政策演變及其影響（1949-1955）》（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有限公司，2012）的相關論述。

23 〈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 年 1 月 19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冊 26，頁 57。

24 〈北平市軍管會文管會關於接管清華、北大維持燕大的專題報告（1949 年 4 月 1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上）》，頁 472。

25 〈燕大情況安謐，中共當局願與校方合作，爲高等教育工作而努力〉，《大公報》（香港版），1949 年 2 月 17 日，第 1 版。

黨員及進步分子的解釋，才把群眾的謬誤想法扭轉過來。」[26]1949 年 4 月初，北平文管會還報告當時燕大存在的問題，如「地下黨翻身情緒比較濃厚，對校政也不大明瞭……對中央處理燕京的方針也不大瞭解，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急需適當解決。」[27]此外，當時中共的幹部、民主黨派人士還經常至燕大校園參觀，並受到校方的接待。如 1949 年暑期，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訪問了燕大，看望了陸志韋。[28]

當時蘇聯關閉了教會學校，燕大的外籍教員擔心與蘇聯關係密切的中共會效仿其模式，故十分擔心教會學校在中國的前途，並在 1949 年底向北京文教局局長也是燕大教授的翁獨健諮詢相關政策。翁獨健則答覆：「只要所有學校遵循新民主主義的原則，那麼它們就會有充足的展示宗教自由與生活的空間……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特質，不會盲目地照搬蘇聯模式，而是有自己的調整方式。」[29]對於燕大的未來，與中共接觸的學校行政高層，認爲燕大將作爲私立機構運行更長時間；校園中的共產黨員卻公開傳播信息，表示政府將在兩到三年時間內全面接管燕大。[30]後來事實證明這種論斷。

（二）學術自由與宗教自由的維護

中共執政後，燕大校內是否可以獲得學術自由？是校方、師生及美方關注的焦點之一，特別是課程如何設置，又是其中重點。當時中共對大學的課程改革，是在原有課程基礎上穩步推進。在 1949 年春季學期，中共對燕大課程開設並未過多干預，多數課程仍然被允許照舊開設，只是停開了「三民主義」等少數帶有鮮明國民黨色彩的課程。對於中共特色的馬列課程設置，陸志韋寄望

26 〈程子華關於北平市警備工作的總結報告（1949 年 4 月 14 日）〉，收入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頁 223。

27 〈北平市軍管會文管會關於接管清華、北大維持燕大的專題報告（1949 年 4 月 1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上）》，頁 472。

28 張偉瑛等編，《燕京大學史稿》，頁 530。

29 Confidential, Peking China, December 30, 1949, AUBCHEAYU, RG011-377-5736-0559.

30 K. Chen's Report to Elisseeff and the HYI Trustees, February 15, 1950, 轉引自樊書華著，方堃楊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 234。

在不同的思想意識之間實行變通，早在 1949 年初即表示：「我們希望達成一種暫時的妥協。我們可能並不反對增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新民主主義的課程，但它們只是在西方世界的經濟、社會及宗教原理的課程中一起被教授。進一步說，我們想要學生保持對任何理論有誠實批評的權利。」[31]但這只是陸氏的一廂情願，在中共的安排下，燕大在 1949 春季學期即聘請沈志遠、翦伯贊等進步教授，來校講授新增設的一些政治色彩很強的馬列課程。負責總務的范天祥對新引進的進步教授在燕大辦理住房手續問題上不合規，在陸志韋面前提出批評，影響其對進步教授的態度。[32]中共還通過燕大學生自治會在 1949 年 5、6 月發動師生參與有關課程與學制改革的大討論，宣傳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爲之後課程改革做好鋪墊。

1949 年秋季學期，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高校課程改革加快。如 10 月 8 日及 11 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33]先後發布〈華北專科以上學校 1949 年度公共必修課過渡時期實施暫行辦法〉、〈各大學專科學校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暫行規定〉，不僅要求華北各高校在 1949-1950 學年的第一學期開設辨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第二學期開設新民主主義論作爲公共必修課，還規定文、法學院各系的具體開設科目，其中政治經濟學爲文、法學院獨有的公共必修課，同時還要求各院系廢除國民黨黨義、六法全書等課程，添設馬列主義的課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課程。[34]燕大校方在新學期的課程開設上也執行這些規定，並且成立了專門的政治課程委員會，安排了沈志遠、趙承信等一批教師授課。燕大全校學生在 1949 年秋季學期都學習了辨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課程，並撰寫了學習總結，文、法學院各系畢業年級的學生則另外加修了政治經濟學課程。該學期，燕大還於各院系增設了大量關於馬列主義、新民主主義、蘇聯及

31 Latest News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January 13, 1949, p. 2, AUBCHEAYU, RG011-377-5736-0473.

32 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宣傳部編印，《陸志韋檢討書》（北京，1952），頁 23。

33 該會 1949 年 6 月 1 日在北平成立，統籌華北地區高校管理。

34 〈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頒布各大學專科學校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暫行規定〉，《人民日報》，1949 年 10 月 12 日，第 2 版。

各種實用技術類的課程，且教學中更多使用中文教科書，以適應中共執政建設的需要，學校的本土化色彩更加濃厚。

中共方面事前曾徵詢過陸志韋對於在燕大開設政治課的意見，並有私立大學暫不設政治課的設想。但陸志韋認爲私立大學應把政治課列爲必修課。[35]由於國民黨也在燕大強制開設過黨義課，故對於中共要求政治必修課，有些燕大師生雖對此頗有微詞，有的甚至認爲是共產黨開展思想工作的武器，但多數表示理解。「由於長期以來進行政治上的灌輸和倫理教育被認爲是中國教育的正統功能，所以把規定必修課作爲當時的正統做法，就其哲學根據而言並沒有遭到多大的反對。」[36]對燕大課程設置如此大的變化，范天祥爲首的部分外籍教師及美國托事部相當不滿，認爲破壞了學術自由及基督教堅持的教育理念，特別是對開設宣揚唯物史觀、無神論的政治課意見最大，雖然無法阻止，但美國托事部提出不爲燕大開設的共產主義與馬列課程提供經費。當時中共仍然允許學生自願選修宗教課程，美國托事部對燕大藉助課程傳教仍然寄予厚望，希望：「不只在宗教課上，在任何合適的時機進行基督教教育，在每門課程中都應好好幫助學生適當地綜合宗教與各種學問。……我們很難估計共產主義思想如何侵蝕著所授的課程，但所幸的是教課的教師，有許多是基督徒。」[37]此外，燕大教師個人的學術研究工作雖然受到一些政治活動的干擾，但並未受到太多影響，基本可以保證其追求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當然，也有林耀華等一些教師，開始主動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從事研究。

在美方尤其關注的宗教自由問題上，由於中共在政策上堅持宗教信仰自由，燕大校內宗教活動在 1949 年並沒有受到太多干涉，團契活動、各種禮拜、聚會等照常進行，但不能強迫師生參加。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在 1949 年 2 月 1 日做的〈中國革命〉的報告中提到，在數次談話中，共產黨的負責人都

35　董天民等，〈陸志韋先生傳略〉，《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北京，2006），頁 17。

36　傑西．格．盧茨（Jessie Gregory Lutz）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頁 431。

37　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宣傳部編印，《陸志韋檢討書》，頁 24。

清晰地說明將會給予宗教自由，並且也會寫到未來的憲法中。這意味著在校內可以自由做禮拜，開展宗教活動，包括傳教與講道。當然宗教自由也意味著可以自由批評、嘲笑甚至攻擊宗教。[38]燕大仍然被允許舉行大型的宗教集會。如 1949 年 2 月 4 日，北平各教會領袖在燕大開會，討論如何應付新形勢。陸志韋、趙紫宸在會上發表演說，強調教會今後要努力認識時代，改變依靠外國的想法，認眞檢討過去的缺點。此後華北基督教聯合會又於 2 月 23-25 日在燕大開三天退修會，趙紫宸進行了六次演講，提出教會的問題及未來出路。趙氏演講對教會絕大多數守舊的教師極不中聽，多有認爲趙的思想也成問題。[39]

燕大宗教學院被信奉無神論的中共准許繼續開辦。在趙紫宸帶領下，宗教學院的學生還於 1949 年 2 月到北平各教會宣傳介紹新形勢及中共的宗教政策，特別是傳達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但強調教會不能與政府爲敵。[40]而且在 1949 年春季學期，學生有所增加，達到 20 人。[41]趙紫宸於 6 月 21 日致在美國的蔡詠春信中曾稱：人民政府展現出自身很開放，並不排斥任何一方；我們學院已被許可辦下去，學院每年的外部收入也被允許匯來。[42]面對一些基督徒學生放棄信仰及教會處於迷茫的局面，宗教學院人士也在討論調整以適應新政權需要。趙紫宸還重新評估宗教學院工作，並且發動了在共產主義的刺激挑戰下，針對牧師、教徒的重振運動。[43]

但是宗教活動仍然不可避免受到政治氛圍的影響。1949 年春季學期開學後，學生參與宗教活動的人數在減少，「燕京大學禮拜與往昔的盛況不能比了。若不是名講員來講道，則參加禮拜的同學總是比西籍教授少。最少的時候，同學在座者只有十餘人。這是燕京從未有過的現象。」[44]再如 1949 年 10 月，燕

---

38 T. C. Chao, "Revolution in China," February 1, 1949, p. 3, 《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50074。

39 〈北平教會概況（1949 年）〉，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100-001-01023。

40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The Christian Century*, 66:37 (September 14, 1949), p. 1066.

41 Letter from Prof. Bliss Wiant to Dr. R. J. Mcmullen, p. 3, April 3, 1949, AUBCHEAYU, RG011-377-5736-0496.

42 〈趙紫宸致蔡詠春的信（1949 年 6 月 21 日）〉，《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4009。

43 Lucius C. Porter's Letter of August 27, 1949, p. 2, AUBCHEAYU, RG011-377-5736-0540.

44 田常青，〈燕京團契〉，《消息》，期 29（1949 年 4 月），頁 6。

大合唱團在排練神曲《彌賽亞》時，卻有些激進學生向指揮者范天祥提出在前半小時應該先練習歌頌毛澤東的歌曲。遭到拒絕後，他們就自己組織演唱愛國歌曲以干擾正常的排練，希望使其他人洩氣而退出，但未能成功。[45]所幸燕大合唱團每年聖誕節演唱《彌賽亞》的傳統，在 1949 年底仍得以保持。但是 1949 年的燕大聖誕節，由之前的放假 3 天改爲 1 天，許多慶祝活動被迫簡化，中外師生們仍舉行了聯歡。[46]

燕大基督教團契是校內最大的宗教組織，中共接管北平後，契友減少，面臨很大的危機，從極盛時期的 28 個團契，契友 400 餘人，到 1950 年初只剩下 11 個團契，契友人數也只剩 150 餘人。[47]在時代轉變的激流中，契友反應不盡相同。當時燕大有些契友禁不起別人指責其爲「落伍分子」而離開團契；有些契友參加了革命工作，或參加學校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放棄原來的小團契；更有幾個小團契認爲在新時代中，革命工作不必藉團契的形式來搞；還有激進的契友認爲團契有礙對於革命的專誠，應當反對，應當停止。[48]這反映出燕大團契在新時代的困惑，開始調整工作重心，關心現實問題，與大眾生活接近。對於新形勢下的宗教工作，當時專門資助燕大團契等宗教活動開展的麥克布雷爾基金（Mcbrier Fund），在 1949 年 6 月對 1949-1950 年的燕大宗教工作提出建議：「目前最緊要的需求是撰寫最新的基督教文字以迎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挑戰，並且幫助非基督徒、基督徒學生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本質，提出有效的反駁對基督教批評的觀點，同時也要反駁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指出其缺陷以及對人類生活精神價值的貶低。」[49]

---

45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19.

46 周紹昌，〈緬懷陸志韋校長〉，收入王大鵬主編，《北京大學校友憶往錄：夢縈未名湖》（煙臺：黃海數字出版社，2014），頁 89。

47 張秀，〈北京清華燕京的基督教學生工作概況〉，《消息》，期 37（1950 年 3 月），頁 9。

48 雅各，〈時代轉變中的燕大基督教團契〉，《恩友團契月刊》，卷 1 期 1（1949 年 4 月），頁 16。

49 The Mcbrier Fund at Yenching Suggestions for the Year 1949-50,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UBCHEAYU, RG011-369-5668.

二、共度時艱：燕大人事與經費問題的統籌

（一）人事問題

隨著局勢的穩定，燕大教學秩序日趨恢復正常。當時燕大仍由原來的人員管理，中共並沒有像北大、清華等國立大學那樣派駐任何組織、人員進行管理，這是對教會大學的特殊政策。1949 年 1 月 24 日，范天祥組織校內的中外教職員推舉一直代理校長的陸志韋爲正式的燕大校長，燕大董事會及托事部隨後也陸續通過這一決議，但陸志韋卻以無法承擔重任爲由表示了謝絕。實際上是他不想成爲美方控制下的校長，且在新形勢下面臨各方面的巨大壓力。雖然他在 3 月 12 日收到托事部同意的正式決議，但在 4 月 5 日給托事部信中，以性情不適合做大學行政負責人表示拒絕。陸志韋曾回憶：「托事部的批准只是像抗日戰爭以前的形式，並不是表示要我做燕大的眞正行政領導人，他們和在校的美國人都是明知經濟權不操在我手裡。」[50]

陸志韋雖然一再拒絕校長任命，但仍是燕大校務（行政）委員會主席並代行校長職務。當時范天祥作爲美國托事部在燕大的連絡人，代表外國教員同陸志韋共同維持燕大，並且代理燕大總務主任。根據兩人分工，范天祥是財務總監，與托事部接洽經費，並負責校內總務和宗教工作；陸志韋負責教學業務和學校的對外聯絡。[51]兩人對燕大未來則有不同看法，陸志韋對中共比較認可，並且試圖依靠中共當局謀求燕大新出路，與中共密切往來，並受到中共高層禮遇，導致托事部的抱怨。1949 年 4 月 2 日，陸志韋曾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表明對中共的態度：「我們應該對他作誠意的批評，不要只是頌揚。同時也要了解政府的苦衷，不要故意使他爲難。」[52]范天祥則代表美方觀點，意圖保留燕大的私立地位，確保學術與宗教自由，堅持教會大學的辦學宗旨。對於中共、美

---

50 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宣傳部編印，《陸志韋檢討書》，頁 13。
51 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宣傳部編印，《陸志韋檢討書》，頁 18。
52 〈燕大師生大會，陸志韋一席話〉，《進步日報》，1949 年 4 月 4 日，第 3 版。

方及燕大三方的關係，到 4 月初，北平文管會報告對燕大缺乏領導，且未提出燕大辦學的新方針，特別提到：「陸志韋已經逐漸有實權，以前在美籍教授手裡的校政據傳說也漸漸交出來了（但極有限度）。」[53]對於燕大校方高層在新形勢下的態度，陸志韋在 6 月 16 日致司徒雷登信中稱：「大多數成員急於將政治議題和貿易、金融議題分開。他們不想讓『國際路線』或我們的國家態度問題獲得討論。出於好意，他們不願見到燕京大學涉入國際政治，或燕京的中國籍教師在國際關係中表露出明確的政治傾向。」[54]

中共方面則強調中國人應掌握私立大學的大權，外國人則只是處於輔助作用。1949 年 6 月 13 日接見輔仁大學的美籍教會駐校代表芮歌尼（Harold Rigney）時，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周揚提出：「外國人在中國開辦學校無任何特權，應將學校主要行政權交給中國人，自己則於一般中國教授處於同等地位，因而享受同等的權力。」[55]7 月 10 日，趙紫宸在致吳貽芳信中也提到燕大管理權應該掌握在中國人手中，並提到燕大還有美方實際控制人（范天祥）、女部主任、理學院代理院長三名外國管理者。[56]燕大校內的中外人員也在協調內部關係，8 月 18 日，范天祥與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文學院院長齊思和一起開會研討未來形勢，都同意當前應該團結一致，現在支持陸志韋最重要。[57]對於中外權力之爭，已返回美國的司徒雷登在 9 月 7 日還曾提到，在燕大的外國人同中國人一樣起到重要影響，但是他們應該把顯要的位置都交給中國人。中共需要傳教士，但是不讓他們操控校政。[58]

53 〈北平市軍管會文管會關於接管清華、北大維持燕大的專題報告（1949 年 4 月 1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上）》，頁 472。

54 林孟熹，〈陸志韋致司徒雷登函〉，《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頁 272。

55 轉引自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 48。

56 〈陸志韋致吳貽芳的信，1949 年 7 月 10 日〉，《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21。

57 〈一個外國人在燕京大學活動情況〉，《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21。

58 Confidential Dr J. Leighton Stuart, September 9, 1949, Central File: Decimal File 893.00, Internal Affairs of States, China, Political Affairs, October 11, 1949 - December 31, 1949, MS China: Record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5-1949, 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 Washington, DC.

與燕大權力交接平穩過渡不同，當時輔仁大學校內的各種矛盾較多，芮歌尼在 1948 年底時即稱讚燕大的行政情況：鑒於燕京大學在過去「委任中國人擔任大部分的重要職務，學校預算的擬定和支出都由中國人佔多數的委員會決定」，這使得「燕京大學在毫無任何困難下邁入新的形勢」。[59]燕大校內的行政組織在 1949 年進一步變革，新成立的校內各組織成員由之前上層菁英擴大到普通師生，且中方人員比例增加，特別強調中共堅持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燕大學生自治會的組織，以往是立法與行政分立的，在春季學期，立委會已組成修改會章委員會，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制定學生會新會章。[60]再如燕大 1949 年 9 月新組成的校務委員會成員，不再像以往那樣是上層行政人員、教授，且數量上從 1948 年秋季時的 9 名改組擴大為 21 名。這些成員涵蓋了校內各階層代表，除了代理校長陸志韋外，還有教務長、總務長及文、法、理三院院長、女部主任共 7 人為當然委員，另有 6 名教授，講助 2 人，職員 2 人，工友 1 人，學生 3 人。[61]而且在這 21 人中，僅有范天祥、賴樸吾（Ralph Lapwood）、夏仁德（Randolph C. Sailer）3 名外國人，且後兩人還對中共持支持態度。因校務委員會為燕大校內的最高決策及執行機構，這種新的行政構成，也可以最大限度聽取基層師生的意見，並且對於不能達成一致的決議採用投票決定，可以確保佔人員多數的中方教職員能夠掌握校政。陸志韋努力在校務中堅守持平中和的立場，他在 11 月 1 日給明思德信中還提到曾發表聲明，希望在燕大的中國人做到在舊軍閥政權下可以承受的，在新政權也應該可以堅持；同時希望在燕大的西方人做到在自己國家所可以容忍的，在中國也應同樣可以接受。[62]從 1949 年燕大人事情況看，陸志韋為首的中方人員已經逐漸掌握了校政大權，美國教員及托事部已無力阻止各項校務改革。

59 SVD Generalate Archives, Rome: Rigney's Report for February 1949, March 1, 1949, pp. 8531-8533，轉引自劉建平，〈1950 年「輔仁大學事件」歷史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57-58。

60 燕大通訊組，〈學校生活〉，《人民日報》，1949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61 〈燕大昨開學〉，《進步日報》，1949 年 9 月 20 日，第 3 版。

62 A Letter Dated November 1 from Dr. C. W. Luh, Yenching University, p. 5, AUBCHEAYU, RG011-377-5736-0554.

（二）辦學經費問題

中共接管北平前後，經費問題是困擾燕大辦學的一大難題，也是三方博奕的核心問題。當時燕大財政緊張，導致學校正常運轉面臨困難，也需校方與中共、美方合力解決。在燕大歷來收入構成方面，西籍教員的薪水撥款以及基金收入佔一半左右，這兩項主要由美國托事部統籌管理，1949 年仍然保持正常。但以往的國民政府補助、臨時募款在此時已經斷絕，同時，原本學生繳納的費用在抗戰勝利後佔燕大收入 6-8%，但在 1949 年時，很多學生因經濟困難，無力繳納學宿等費用，此費用當時僅佔燕大收入 2%；[63]加上物價飛漲、貨幣貶值，更是雪上加霜，導致燕大經費嚴重不足。因關係到校內師生生計，負責總務的范天祥十分關心物價、貨幣情況，在其 1949 年的英文日記中，經常記載當天的物價變化以及美元與人民劵匯率的波動等詳情。此類情況在燕大歷史系教師鄧之誠 1949 年的日記中同樣也有大量記載，反應了當時中外教師對物價上漲的高度關注。

1949 年初的北平，物價上漲之風仍然沒有止住，因糧價飛漲，1 美元只能購買小米七、八斤，燕大原有的美方經費僅爲原預算十分之四，[64]美方提供的經費已經無法滿足校內開支。受在華教會學校自身加強本土化趨勢的影響，在中共執政北平的情況下，陸志韋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希望不用美國經費。如 3 月 26 日，范天祥在當天日記中也稱陸志韋不想要來自美國的經費。[65]陸志韋在新形勢下主動尋求中共的支持，如他在 1949 年 1 月曾托人向毛澤東轉達希望中共直接接管燕大的意願，由中共承擔中方教職員的薪水，校內西方人員、研究、設備和整體運作的費用則由外國經費承擔。[66]但當時中共正南下作戰，財政困難，權衡輕重，中共當局採取了權宜辦法，即學校經費仍由美國解決，

63 〈解放初期燕大經濟情況及軍管會給燕大款糧之函件，申請經濟援助說明書等（1949 年）〉，《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19。

64 〈財務工作總結機及其他財務方面的材料（1949 年）〉，《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08。

65 《范天祥日記（1949 年 3 月 26 日）》，《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23。

66 A Letter Dated November 1 from Dr. C. W. Luh, Yenching University, p. 4, AUBCHEAYU, RG011-377-5736-0553.

國家給燕大補貼日常急需的現金和口糧。[67]早在 1948 年 12 月下旬，爲解決師生口糧和教師工資，十三兵團同意借撥燕大 500 萬元長城銀行票。因經費仍然緊張，1949 年 1 月 20 日後，根據燕大請求，北平的人民銀行借撥 30 萬元人民劵，但因未接到中共中央具體指示，故要求燕大付予每月 12 釐的相對較高利息。2 月中旬，在接到中央關於對燕大維持現狀指示方針後，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北平軍管會）開始向其大規模放款，允許無息供給人民劵 130 萬元及發給學生救濟米 1.5 萬斤。[68]此外，燕大還向北平的海澱商會、天津工商界人士借款及籌糧。

在此形勢下，燕大面臨何處理同美方、中共關係的棘手問題，一方面還不能失去美方的撥款，一方面還寄望中共援助。因地位特殊，而且被中共認定政治上較爲進步，當時的燕大受到中共較多的照顧，在 1949 年春季領到補助費約 1.5 萬美金。[69]爲維持學生膳食，燕大繼續不斷向中共當局借糧，如 2 月分向北平軍管會借小米 1.5 萬斤，3 月分借 3.2 萬斤，4 至 6 月分則是每月借 2.4 萬斤。[70]而在支付教職員薪水方面，燕大則是向北平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等，每月不斷地借款。然而這些借款仍然不能滿足燕大的財政支出，7 月 5 日，陸志韋還致電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告知本年度收入 24 萬美元，支出 30 萬美元，有 6 萬美元缺口，特申請補助全年小米 200 萬斤作爲教職員薪水及行政費之用，希望分六次支付。[71]對此請求，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分批給予力所能及的補助。此外，燕大校方還鼓勵師生開源節流，保持節約習慣，共渡難關。燕大通過上述各種途徑獲得的借款、補助發放教職員薪水與其他開支，教職員的工

67 董天民等，〈陸志韋先生傳略〉，《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頁 15-16。

68 〈北平市軍管會文管會關於接管清華、北大維持燕大的專題報告（1949 年 4 月 1 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上）》，頁 472。

69 A Letter Dated 28 June 1950, from Dr. C. W. Luh, Yenching University, p. 1, AUBCHEAYU, RG011-377-5737-0567.

70 〈財務工作總結機及其他財務方面的材料（1949 年）〉，《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08。

71 〈解放初期燕大經濟情況及軍管會給燕大款糧之函件，申請經濟援助說明書等〉，《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19。

資則通過發放糧食代替貨幣以減輕貨幣貶值影響，並在每月分批發放，且數額有一定程度縮減。但是這些舉措仍無力改變燕大入不敷出的困局。

陸志韋爲了維持師生生活及繼續辦學，只能繼續向美國托事部爭取經費。4 月 5 日，陸志韋在致明思德的信中稱：燕大有一半以上學生依靠中共當局的資助來維持生活。現在財政面臨 50%的嚴重赤字，請求托事部 1949-1950 年度資助燕大的經費預算爲 6.7 萬美元。[72]因托事部遲遲不回覆，而燕大經費困難，陸志韋對此十分焦慮，爲此他在 5 月 31 日給南京的司徒雷登寫信，希望其可以向托事部進行斡旋，提出如果紐約方面在二、三周內沒有信來，只有解散燕大或轉交政府，以減輕其責任的過激想法。[73]同日，陸志韋還發布致燕大全體同仁公開信，除了就調低教職員薪水進行解釋，強調不會大量裁員外，還稱托事部原則上已經決定竭力維持燕大，但維持到什麼程度，我們沒有清楚的瞭解，故無法編造財務預算，也無法向別方面請求補助。[74]所幸美國托事部不想放棄燕大，明思德在收到其經費請求後，在 6 月 2 的致陸志韋信中稱，在保證宗教和學術自由前提下，並起著基督教大學的作用，托事部準備在經濟上盡可能地支持燕京。而且他還提到燕京有一筆相當多的預備金，可以在急需之時提取，並同意了陸志韋請求的 1949 年度的 2 萬美元津貼。[75]7 月 10 日，陸志韋在給金陵女子大學吳貽芳的信中還稱：「下一學年，學生學費在總收入中占比不超過 3%；學校預計有 18-25%的赤字。」[76]進入秋季學期後，燕大學生增多，很多學生仍然無力繳納學費及解決膳食問題。當時北平的中共當局只能爲大約 25%的燕大學生提供膳食補貼，所幸托事部仍然提供燕大經費，到 1949 年 9 月，燕大已收到該部共 35,365.7 美元的經費，對緩解其財政緊張幫助甚大。[77]

---

72 From C. W. Luh to Robert J. MacMullen, April 5, 1949, p. 2, AUBCHEAYU, RG011-377-5736-0498.

73 〈1949 年 5 月 31 日陸志韋給司徒雷登的信〉，《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22。

74 〈解放初期燕大經濟情況及軍管會給燕大款糧之函件，申請經濟援助說明書等〉，《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19。

75 〈1949 年 6 月 2 日紐約聯合托事部執行秘書麥默倫給陸志韋的信〉，《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22。

76 〈陸志韋致吳貽芳的信，1949 年 7 月 10 日〉，《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21。

77 “Funds Reach Yenching with Little Difficulty,” *Yenching News*, 28:1 (November 1949), p. 1.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陸志韋試圖擺脫美國經費的意識更強，但由於中共自身財政緊張，仍然在要求美國不干涉燕大校政下，繼續讓燕大使用美國經費，同時提供一定的幫助。如 1949 年 11 月 1 日，陸志韋在給托事部的信中曾提到，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已通過不同形式提供超過 2 萬美元的幫助。[78] 在 1949 年秋季學期，陸志韋在繼續向中共請求借款時，還向托事部提出增加學生補助金。托事部 12 月 21 日答覆稱，將會籌措款項分配給在華的教會大學，允許各大學依照它們認爲最好的補助學生辦法抽用部分款項。[79]雖然美方、中共及校方對辦學方針存在分歧，但維持燕大運轉的目標是一致的，故在三方努力籌措經費下，保證了燕大正常辦學。

三、疑慮、希望與融入：燕大校內群體眾生相

中共接管北平前後，燕大校內的不同群體對新形勢產生了不同的看法，對中共的認識也經歷了轉變過程。1949 年，多數中國師生逐漸認清國民黨在大陸必敗的大勢下，從觀望到積極融入新社會，對中共新政權充滿了希望，特別是黨團員的態度最爲積極；外籍教師對中共態度則多是從疑慮到坦然接受；傳教士與基督徒雖然對新局勢最爲擔心，但也在尋求與新社會的融合。

（一）學生與黨團員的反應

中共佔領北平西郊後，還有 700 多名在校學生選擇留校。此時學生們心態複雜，對中共及個人未來出路充滿疑慮。燕大校方爲此專門舉行政策理論學習，各系各年級舉行座談會，讓學生們暢談各種有關就業、未來出路等思想顧慮。當時學生存在很多疑問，有學生「懷疑共產黨勝利以後會不會像過去歷次假革命者一樣腐化變了質……新社會裡的幹部使用制度與個性發揮有無矛

78 A Letter Dated November 1 from Dr. C. W. Luh, Yenching University, p. 4, AUBCHEAYU, RG011-377-5736-0553.

79 〈1949 年 12 月 21 日聯合托事部執行秘書羅勃 · 丁 · 麥默倫給陸志韋的信〉，《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22。

盾？中國革命為什麼非無產階級領導不能勝利？將來轉向社會主義社會能夠不流血嗎？」[80]還有學生對中共保持旁觀的態度，如陶文達對於共產黨的看法是：「共產黨既有今日，必有相當的道理，應該重新加以估價。他們既說為人民服務，那就給他們機會，看看他們怎樣搞。」[81]1949 年初，在校內地下黨的發動下，多數學生政治熱情高漲，經常讀報瞭解時事，並在一起討論國家大事。部分對中共懷有嚮往的學生甚至一度有參軍打算，如歷史系學生夏自強與新聞系學生高健飛曾騎車到平津前沿指揮部——三家店找到劉道生，要求參軍，後被勸說回校，也向他們說明中共軍隊不再接受個人的投奔，而要聽從組織調遣。[82]但也有少數對時局悲觀，並反應過激的學生，如燕大研究生侯國聘在時代巨變中，因思想困惑在 1949 年春選擇跳湖自殺。[83]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接管北平後，雖然國民黨、三青團被取締，仍有國民黨安排的學生在學校內活動。如曾擔任燕大學生會主席的夏自強曾回憶說：「那時上海一個特務學生，隱瞞身分混入燕京大學，十分囂張，散播反動言論。我們配合公安機關，查明實情，召開大會，揭露他的反動言行，當場逮捕，提高了大家的認識。」[84]

中共還注重教育為國家服務，發動學生參與中共接管北平。1948 年 12 月 29 日，東北野戰軍派幹部到燕大，希望學生們為中共接管北平做準備工作，如維持秩序、保護財產及宣傳中共政策等。[85]這也得到了燕大的積極回應。燕大學生自治會和教職員工聯合會代表在當天即成立燕京大學迎接解放行動委員會，為迎接中共接管北平城區進行各項準備工作，如組織報告會、印發宣傳材料、集體討論等方式，幫助師生瞭解學習時事與中共的各項政策。中共地下黨也動員學生們參加入城服務，並請政工幹部、專家對燕大學生進行宣講。燕大地下黨葉祖孚回憶稱：「當時的工作重點是做好系級的群眾工作，發動大家

80 楊承棟，〈解放後的清華和燕京〉，《中國青年》，期 4（1949 年 2 月），頁 16。
81 陶文達，〈我從政治課中得到了什麼〉，《新燕京》，期 10（1950 年 1 月），第 2 版。
82 夏自強著，鄭必強編，《一生的燕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292。
83 倪艮山，《沉思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 37-38。
84 夏自強著，鄭必強編，《一生的燕園》，頁 293。
85 Ralph and Nancy Lapwood,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tchworth, Herts: Garden City Press Ltd., 1954), p. 48.

討論如何迎接北平的解放，動員大部分同學進城去參加宣傳工作。我所在的那個系經過反復工作，包括個別談話等，同意進城的人越來越多。」[86]2 月 3 日，中共部隊入城後，經過地下黨的充分發動，燕大約 300 名學生參加入城工作隊，[87]按照文、理、法三個學院分成三個宣傳大隊，在城裡開展了十天的宣傳工作，進行文藝演出，街頭宣傳，介紹中共的政策。之後，燕大部分學生還根據北平軍管會的需要，參與了北平市區內接管舊政權、建設新政權的工作。因學生忙於迎接中共接管北平，影響正常學習，校方被迫同意學生提出的延遲期末考試的請求。

1949 年春季學期，因受局勢影響，燕大學生減少 300 多人，但有 100 多名新同學加入，3 月 2 日燕大正式上課後，註冊學生僅 630 人。[88]根據中共的統一安排，爲響應東北野戰軍南下號召，經過選拔後的 70 多名燕大學生於 3 月 9 日提前離開燕園，編入該部隊南下工作團一分團一大隊，[89]隨部隊參加南方城市的接管、建黨、建政、維護社會安定和農村開闢工作。但也有學生認爲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如大四學生倪艮山並未報名參加南下工作團，曾對此回憶稱：「當時我考慮革命事業方興未艾，大量工作需要專業人才。我僅剩一個學期即將畢業。我應當修夠學分，完成畢業論文，掌握科學知識，從而更好地報效國家。」[90]此外，燕大社會學系學生還響應中共號召，貼近社會，到北平郊區的農村做鄉村調查並服務農民，加深了對中國農村、農民及農業的理解。

當時燕大多數學生已經厭惡國民黨的統治，通過與中共的接觸瞭解，轉而贊成新民主主義，對中共的執政保持樂觀希望。1949 年 8 月 26 日，范天祥在

---

86 葉祖孚，〈難忘的 1949 年〉，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的黎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頁 260。

87 鄧之誠著，鄧瑞整理，《鄧之誠日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冊 5，1949 年 2 月 3 日，頁 3。

88 Extract of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Dr. C. T. Lin, March 23, 1949, p. 2, AUBCHEAYU, RG011-377-5736-0493.

89 李聯模，〈燕大同學參加南下工作團的回憶〉，收入楊正彥主編，《雄哉！壯哉！燕京大學 1949-1951 級校友紀念刊》（北京，1994），頁 223-224。

90 倪艮山，《沉思集》，頁 39。

信中曾稱：「學生們對於新的自由與民主的新原則十分感興趣，因此多年來在政府與學生間的衝突已經完全消失了。」[91]但燕大學生在 1949 年對中共仍然處在瞭解階段，還未達到全面支持程度。如在 1949 年 11 月，燕大政治課程委員會對在校學生調查了 10 個問題，並對 600 份答案卷進行統計，其中第 3 個問題爲：「學術是多方面的，共產黨也有一套，我們不妨瞭解瞭解，學習的時候還得要用批判的眼光，自己拿主意。」對此，33.5%學生同意，13.66%懷疑，46.83%不同意，其餘爲無意見或未答。[92]可見當時學生內部對中共的不同認知。特別是作爲「貴族學校」的燕大，部分學生家境殷實，出身官員與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長期受國民黨宣傳影響，對中共仍帶有疑慮。

燕大校內的地下黨組織在中共接管北平西郊前即開展秘密活動，組織師生參與民主運動。當時燕大地下黨存在南系、北系兩個黨支部，1949 年 1 月，燕大南系、北系兩個黨支部正式合併，成立了新的中共燕京大學支部。2 月 4 日，燕大地下黨員參加在北大四院舉行的北平市地下黨員會師大會，這也是燕大地下黨員第一次公開全體會面，說明地下黨單線聯繫結束，開始從地下轉到地上公開活動。[93]但在中共接管西郊初期，燕大黨員左傾情緒極高，經常提出翻身的口號，在工作方式上仍是地下方式，有些生硬，民主作風不夠，對於意見分歧只是採取簡單化的「表決」，有違中共的城市政策與知識分子政策。如 1949 年 2 月初，據在燕大、清華做學生工作的中共人員許立群報告，燕大黨員有 60 人，「許多黨員過去與群眾聯繫很少，擔任公開工作後，把黨內的工作方法（嚴格的紀律與集中制）無區別地帶到公開工作中去（燕京某中間分子女學生被批評哭了），要求群眾照辦，對於中間群眾尚未馬上接受的『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口號，急於在群眾會上喊出去，群眾對校中公開機構

91 Excerpts from A Letter Dated 26 August 1949 from Dr Bliss Wiant, Yenching University, AUBCHEAYU, RG011-377-5736-0534.

92 張緒生，〈關於政治課測驗第一類答案的統計〉，《新燕京》，卷 1 期 5，第 2 版。

93 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的歷程：燕京大學地下黨概況（1925-1949.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225。

幹部有了許多不滿。」[94]

燕大黨支部在中共接管北平後遲遲沒有向師生公開，也在黨員內部引起爭論。在公開以前，支部進行了多次討論，有同志認爲公開是爲了和群眾聯繫得更密切，也爲了更好地克服各種缺點；也有同志害怕公開後受同學批評，影響黨的威信，影響工作。[95]最終根據中共北平市委指示，直到 1949 年 6 月 29 日，燕大共產黨才向全校公開，黨員名單公布在燕大圖書館外圍牆上，其中有 2 名女學生黨員，下層職工中有 3 名黨員，化學系則有 1 位教授、7 位學生是黨員。[96]中共在燕大公開後，1949 年 7 月 3 日舉行了 16 位黨員的入黨儀式，這是燕大首次公開的黨支部會議。黨員公開引起燕大師生強烈反應，紛紛發表了對黨的看法。如燕大物理系主任褚聖麟希望以後要多多解釋黨的性質，使大家了解。有些同學認爲黨支部的決定常常是正確的，但有些黨員在執行時有些機械，沒有說服能力，希望以後多加注意。[97]還有不少師生希望黨員不但要把工作做好，還要推動和幫助學校在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下改革課程，並在學習中也起到模範帶頭作用。很多人還提出以後黨和同學們要加強聯繫，多多和同學接觸，要完全和同學打成一片，瞭解同學們的要求和情況。對於個別黨員生硬的作風，要改爲平易近人的作風。[98]

在建團方面，則由中共在燕大的青年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籌畫。在中共佔領北平西郊後，該聯盟由民青、民盟、社青等 6 個外圍組織合併而成，1949 年 1 月時有盟員 110 人。但合併只是名稱的統一，並無獨立的領導機構，急需健全組織。[99]直到 1949 年 3 月初，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在燕大

94 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等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48.11-1949.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集 19，頁 217。

95 陸欽儀，〈共產黨燕京支部公開了〉，《中國青年》，期 12（1949 年 12 月），頁 19。

96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205; 陸欽儀，〈共產黨燕京支部公開了〉，《中國青年》，期 12，頁 19。

97 〈北大清華等校黨的支部公開，黨與群眾聯繫更加密切〉，《人民日報》，1949 年 7 月 1 日，第 2 版。

98 陸欽儀，〈共產黨燕京支部公開了〉，《中國青年》，期 12，頁 19。

99 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等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948.11-1949.9）》，集 19，頁 218-219。

宣布公開，並在 3 月 10 日召開盟員代表大會，決定成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燕京籌委會，積極展開建團工作。[100]後燕大各系的盟員先後舉行招待會，向燕大師生宣傳介紹該盟情況，並聽取意見及批評，確保建團工作能更快展開。經過前期籌備，在審查和批准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的成員轉團，並發展一批新團員後，燕京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於 3 月 24 日晚正式成立，132 位同學、職員、工友正式宣誓入團。[101]同年 3 月，燕大的 22 名學生文藝骨幹與清華的 8 名學生還被中共抽調參加北平市青年幹部培訓班，專門為北平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培訓幹部。這些學生都在培訓結束後轉為團員，並組成北平市青年文工團，通過文藝形式來配合建團工作。[102]當時燕大的團組織也積極發展學生入團，對於其程式，時為歷史系學生的余英時回憶，稱當時歷史系團組織多次勸說他入團，最終他被說動，團組織的勸說理由則是：「入團對於個人不但沒有任何實際利益，而且要求個人作出更大的犧牲；團員在組織中，由於得到群體的幫助，更能發揮個體的能力等等。」[103]在余英時申請入團後，團組織又對他展開調查，聽取師生對其平常言行的意見與質詢，其後又經過兩三個月考察期，才正式同意他辦理入團手續，但此時余英時已離京在港，最終未果。還有學生通過參加政治討論小組，學習馬列主義及接觸團員後，對入團產生興趣而申請入團。11 月 12 日，燕大為慶祝十月革命與世界青年日，舉行青年日活動，當天晚上是青年團燕大總支部團日活動，有 32 位同學宣誓入團。[104]之後燕大團總支還通過團課對團員進行繼續培訓。

在有中共活動特色的政治學習上，1949 年上半年，燕大部分學生已經在校內地下黨的發動下，通過學習小組、座談會等形式，進行了各種有關中共提倡的新民主主義學習活動。而且艾思奇、錢瑞俊等多位馬列主義專家與中共幹部，本年曾來燕大為師生進行新民主主義與中共政策的報告宣講，用馬列主義

100　〈清華燕京將成立新青團〉，《大公報》（香港版），1949 年 3 月 17 日，第 1 版。

101　〈新青團燕大總支部成立，百餘人宣誓入團〉，《北平解放報》，1949 年 3 月 26 日，第 2 版。

102　江平口述，陳夏紅整理，《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 59-61。

103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 87。

104　〈慶祝十月革命，燕大歡度青年日〉，《新燕京》，卷 1 期 3（1949 年 11 月），第 3 版。

觀點教育師生。1949 年暑假，爲糾正當時相當普遍地存在於知識分子中的思想問題，如超階級的思想，走中間路線的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反國際主義的思想以及對歷史、對革命的錯誤看法等，[105]燕大部分學生特別是黨團成員還參加了中共北平當局組織的各種學習團與訓練班，幫助學員進一步加強對中共及新民主主義的瞭解，與中共的聯繫更加密切。但在暑期培訓結束後，對於政治學習，燕大黨支部內部卻出現了分歧。大部分黨員認爲校內黨團員應以業務學習爲主，政治學習不應該衝擊業務學習，但卻有少數人堅持黨團員應該首先保證參與政治學習及運動，雙方爲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106]這種情況體現出了燕大校內黨員對於業務學習、政治學習比重的認識差異，特別是有些政治熱情高漲的黨員習慣了搞學生運動，不重視正課的學習。對此，燕大教師高名凱在《新燕京》發表〈政治學習與業務學習〉一文，稱政治學習是必要的條件，非學不可；業務學習是足夠的條件，沒有它就不能成爲有用的人才。[107]1949 年秋季學期，燕大學生通過校內新民主主義學習活動的開展及政治必修課的開設，熟悉了馬列主義的觀點、立場與方法。雖然各人對進步的要求有程度上的不同，有的急進、有的緩進，但大多數肯定政治學習的重要性和方向的正確。[108]

1949 年 9 月後，迎接新中國成立，成爲燕大學生政治學習的重要內容。9 月 21 日，中共召集的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燕大校內掀起新政協的學習熱潮，學生紛紛看報討論。9 月 26 日，燕大組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委員會，後出版了紀念特刊。9 月 30 日上午，燕大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五星紅旗的升旗典禮，後召開了全體師生大會，報告燕大參加中共開國大典的籌備情況。10 月 1 日下午，燕大大部分師生進城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10 月 2 日，燕大又在大禮堂召開擁護世界和平，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

105 陳泓、王金鳳，〈暑假中的平市師生們——記平市兩萬餘師生的暑期學習〉，《人民日報》，1949 年 9 月 8 日，第 4 版。
106 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頁 1-2。
107 高名凱，〈政治學習與業務學習〉，《新燕京》，卷 1 期 4（1949 年 11 月），第 2 版。
108 林漢達，〈一年來教學方面的總結報告〉，《新燕京》，卷 2 期 6（1950 年 10 月），第 1 版。

會。[109]一時間燕園內充滿了喜慶的氛圍。

與此同時，因中共執政後，全方面地向蘇聯學習，當時燕大校內開展各種與蘇聯相關的活動。如 1949 年 9 月 24 日晚，燕大黨支部、學生會等六單位聯合舉行擁護中蘇友好大會，到會的有 600 餘人。黨支部書記林壽晉及教師翁獨健分別講話，強調要學習蘇聯建設經驗及發展中蘇友誼的重要性。[110]11 月 9 日，燕大爲紀念十月革命節舉行紀念會，並在會上宣布成立中蘇友好協會燕京支會的辦法和步驟。後經過選舉，12 月 7 日，中蘇友好協會燕京支會首次代表大會舉行，討論支會章程，推選陸志韋任主任，會員人數達 645 名，佔燕園全體三分之一強。[111]12 月 21 日爲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生日，當日晚，燕大在陸志韋帶領下爲斯大林舉行祝壽晚會，內容有演講、遊藝節目，同時祝壽大合唱也演出「斯大林頌」和「斯大林光榮」等歌曲。[112]值得注意的是，受校內向蘇聯學習氛圍的影響，燕大學生對爲其提供辦學經費的美國態度也發生變化。如在上文提及的燕大政治課程委員會對學生的調查中，其中有問題稱：「如果美帝國主義改變政策，承認新中國，和我們通商友好，是不是我們也要倒向美國一邊？」對此，除了未發表意見的學生外，燕大學生有 4.67%表示同意，12.5%表示懷疑，78.16%不同意，[113]可見 1949 年時燕大學生對美的態度。

在中共重視的黨群關係上，1949 年秋季開學時，燕京大學的黨群關係並不樂觀。在學生人數上，由於新學生的大量加入，燕大註冊學生比 1949 年春季學期大爲增加，達到 1,000 人，其中男生 662 人，女生 338 人，而舊生有 456 人，新生有 544 人。[114]當時燕大黨員習慣地下工作方式，不從學生要求出發，

109 〈我們從此站起來了：記燕大師生員工一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燕京大學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紀念特刊》（北京，1949），頁 34-39。

110 〈北京公安局九千人參加中蘇友好協會，華北公路總局、燕京大學集會擁護中蘇友好〉，《人民日報》，1949 年 9 月 28 日，第 5 版。

111 〈中蘇友協燕京支會成立〉，《新燕京》，卷 1 期 7（1949 年 12 月），第 1 版。

112 〈給斯大林元帥祝壽〉，《新燕京》，卷 1 期 8（1949 年 12 月），第 1 版。

113 張緒生，〈關於政治課測驗第一類答案的統計〉，《新燕京》，卷 1 期 5（1949 年 11 月），第 2 版。

114 〈燕京大學全校政治課總結及總結附件，1950 年〉，《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34。

或者只看到學生落後的一面，黨員做起工作總喜歡包辦代替。加上新入學的500多位新同學，大部分來自國統區，對黨、團的認識上存在不少問題。所以黨員與普通學生間的隔閡更深，有的在討論會上不敢發言，說是「怕黨、團員調查思想」。[115]針對此種情況，燕大黨支部通過具體事例糾正黨、團員輕視正課學習的偏向，要求支部活動從群眾要求出發，廣泛吸收同學參加群眾團體的領導工作，邀請他們參加黨團會議，在思想、工作與生活上加強與普通學生的聯繫，使黨群關係得到改善。燕大黨團組織自公開活動後，通過不斷改進工作，在1949年不斷發展壯大，到1950年2月中共燕京大學總支部成立時，燕大在校黨員有73人，團員則發展到320人。[116]

（二）中外教師的複雜心態

1948年底，隨著北平被包圍，國民黨針對北平高校的著名教授開展了「搶救學人」計畫。12月17日，在蔣介石發給傅作義幫忙轉移北平62名教授名單的電文中，燕大只有在政治上支持國民黨的文學院前院長梅貽寶被列在名單之中，歸入因政治關係必須離平者一類，[117]而在此名單的教育行政負責人中並無陸志韋，可能國民黨已經掌握了陸志韋的左傾政治傾向。中共接管北平前後，大部分的燕大教師選擇了繼續留守北平。燕大地下黨也按照中共華北局指示和該局城工部的布置，積極動員勸說教職員留校，特別使少數處於觀望態度的教師決心留校。燕大的中國教師中，只有梅貽寶、蔡一諤、林嘉通等少數教師離開北平。[118]離平的教師多是不能接受中共執政，如梅貽寶後來對其堅持出走的解釋是爲追求個人自由、學術自由，且自己不習慣緘默，不肯低頭妥協，稱像他這樣出了名的加料「落伍」教授，難得善果。[119]他的此種考慮，也代表

---

115 林壽晉，〈從對立到團結：燕京大學黨群關係的改善〉，《人民日報》，1950年5月31日，第3版。

116 〈中共燕大總支部成立〉，《新燕京》，卷1期15（1950年2月），第1版。

117 〈蔣中正電傅作義〉（1948年12月1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197-213。

118 張世龍，《燕園絮語》，頁11。

119 梅貽寶，《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96。

當時離平教師的普遍心理。在當時很多北平的大學教師南下的情況下，趙承信、聶崇岐、趙蘿蕤、侯仁之等在國外進修或學習的學人，卻出於家庭原因、個人理想等各種考慮，毅然在 1949 年前後從國外回到燕大工作。

在國民黨節節敗退的大潮下，燕大多數教師在衡量自身經濟狀況、權衡政治形勢及難離故土等多重原因而決定堅守，並不能簡單地認爲他們是擁護支持共產黨而留在北平。燕大多數的中國教師雖然都希望國家繁榮富強，擺脫內憂外患，但並無太強的政治傾向，在政權更替之際仍是「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的態度，只是對國民黨的統治已經極度失望，還有教師則對中間黨派宣傳的「中間路線」懷有幻想，然而渴望獲得穩定的生活與工作環境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如學者所言：「許多人雖然對共產主義並不熱情，但認爲由中國共產黨人統治比起 1948 年的混亂局面來還是更爲可取。他們盼望共產黨的統治能恢復和平與安定，這樣個人和學校能夠有助於國家的建設，同時有機會可以集中精力於自身的發展與利益。」[120]當時嚴景耀、雷潔瓊等少數進步教師則對中共堅定支持，如早在 1949 年 1 月 24 日，燕京、清華一些教授發表宣言表達對共產黨的期待，他們稱：在獲得了久已喪失的自由和安全之後，我們深切地體驗到一種新氣象的開展。我們爲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們爲中國人民的新生曙光而歡騰。在此份宣言上簽名的燕大教授有張東蓀、嚴景耀、雷潔瓊、翁獨健、林耀華、齊思和、趙紫宸等共 13 人。[121]但當時陸志韋並沒有在宣言上簽名。

當時燕大教師內部的心態複雜，有些人雖然接受了中共執政的現實，但對在新時代的工作生活充滿疑慮，對中共新政權的管理方式及政策仍有質疑。部分教師經過與中共的接觸，逐漸對中共新政權有憧憬之情，轉而擁護中共的領導，渴望在開明的政治環境下爲中國教育事業繼續奉獻力量。「還有一些人，由於他們的社會條件和家庭影響等原因，對中國共產黨還有誤解，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和耐心，等待他們通過事實去改變觀點；他們雖然不贊成共產主義，但

120　傑西．格．盧茨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頁 425。

121　〈清華燕京教授宣言，爲人民的教育努力〉，《大公報》（香港版），1949 年 2 月 4 日，第 1 版。

是他們也願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作。」[122]多數燕大的中國教師對新社會抱有希望，認為學術與政治關係不大；有的留下的教師也厭惡政治，仍然刻意保持與政治的距離，試圖堅持學術的獨立與超越政治。但燕大教師們在新時代的大潮下很難置身事外，保持中立，他們的學術研究不可避免受到政治生活的影響。燕大校內頻繁的政治學習、各種會議討論對教師的學術研究產生了干擾，如曾有一位系主任抱怨，1949 年秋季學期開學後，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晚上。燕大校內的共產黨員也表示學者不應浪費時間、精力與金錢從事與現實無關的研究，而是應服從當前國家的需要。[123]燕大教師面臨如何適應新社會的問題，正如社會學系教師陳永齡所稱：「這次全國即將解放的勝利，決非是改朝換代之事，而是從根本澈底的改變。舊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都要走向崩潰之途，而新的一套已正在茁壯起來。在此社會根本大變動時，必然要發生許多新的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舊的人如何適應這嶄新的社會。」[124]

對於新舊政權交替之際的心理變化，在燕大任教的歷史系教師王鍾翰回憶說：「當時蔣家王朝的覆沒，新中國的誕生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好像與我無關，一無觸動似的。獨健學長卻對我當頭一棒：『解放了！你怎麼不參加學習呢？不學習，做學問也是搞不好的？』」[125]這也反映出燕大教授內部的兩種心態。對於當時燕大教師的情況，余英時曾回憶：「無論是外文系或歷史系的教授們，大體上還能勉強維持著相對的學術尊嚴」；「至於大多數的學生，在政治上採取了不即不離的觀望態度，在學術上則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歷史系而言，當時學生們並沒有覺得，教授都是『資產階級』學者，未經馬列洗禮，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後』或者『反動』。這種看法至少在當時還沒有廣泛流

122 轉引自〈陸志韋傳〉編寫小組，〈陸志韋傳〉，《文史資料選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輯 40，頁 57。

123 K. Chen's Report to Elisseeff and the HYI Trustees, February 15, 1950, 轉引自樊書華著，方堃楊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 246。

124 陳永齡，〈南苑華美莊調查〉，《燕京社會科學》，卷 2（1949 年 10 月），頁 153。

125 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2。

行。」[126]

中共在知識分子政策上，注重團結利用教會學校中的進步中國教師。如 1949 年 1 月，燕大教授張東蓀作爲中間人，往來傅作義、中共之間，參與北平和談，對和平解決北平問題有功。但在 1 月中旬，他和雷潔瓊、嚴景耀等人在西柏坡與毛澤東談話後，他堅持中間路線、親美主張，卻與毛澤東傾向蘇聯一邊倒發生嚴重分歧。[127]1949 年 2 月 17 日，范天祥在信中提到：「我們的校長陸志韋博士在政府高層當中有一些摯友。其他學系的成員亦同樣與政府高層有聯繫。看來沒有其他私立大學能有像燕京大學這般的良好待遇。」[128]陸志韋並曾在 3 月 25 日受邀到南苑機場歡迎毛澤東，其後經常受邀參加中共高層召開的有關會議。他還曾受中共指派，以私人方式在 6 月 16 日致信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希望其來燕大訪問。之後作爲燕大畢業生的中共代表黃華，也在 6 月 28 日與司徒雷登會面時，商談前往北平事宜，雖然司徒雷登有意赴平，但最終因美國政府的反對而未果。[129]9 月 21 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始後，陸志韋、雷潔瓊、趙紫宸、張東蓀、翦伯贊、沈志遠、嚴景耀、林漢達、馬思聰等 9 名燕京大學教師以不同身分代表出席。

燕大很多進步教師在中共的機構中任職，如陸志韋、雷潔瓊、張東蓀在 1949 年 6 月受命參加新成立的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歷史系教授翁獨健在 1949 年 10 月出任政務院下屬的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同年 12 月又被任命爲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首任文教局局長。當時在歷史系就讀的余英時對任課教師翁獨健從政之舉感到非常意外：「因爲他在班上從不流露出任何政治傾向，也從無一句政治宣傳的話，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和共產黨在政治上竟已達到如此互信的地步。」[130]對於這些進步教師的選擇，正如學者在評價陸志韋 1949

126 余英時，〈燕京末日的前期〉，轉引自陳遠，《燕京大學（1919-1952）》，頁 216。
127 詳情可參見左玉河，《張東蓀傳》（北京：紅旗出版社，2009），頁 271-278。
128 轉引自范燕生著，李駿康譯，《穎調致中華：范天祥傳——一位美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生命交流》，頁 252。
129 對此事的前因後果，可參見林緒武，〈黃華與司徒雷登南京商談考析〉，《歷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頁 168-182）中的有關敘述。
130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頁 84。

年的選擇時所稱：「從書生兩耳不聞窗外事到活躍於政治舞臺，折射出時代鋪天蓋地的巨變，這並不是陸志韋一個人的人生選擇，而是整整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共同命運。」[131]

燕大教師出於自己的認識，或主動或被動地與中共合作，使得燕大既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又逐漸逐步被納入中共管理之下。中共出於改善中美關係的考慮，仍然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區別對待，如 1949 年 8 月，美國國務院發表《對華問題白皮書》後，燕大起草一份抨擊白皮書的聲明，並上呈中共高層審批。但周恩來過目後，卻稱此聲明攻擊所有美國人，會引起支持燕大的美國人仇恨，進而影響燕大的資金來源，故提議聲明應該集中攻擊美國政府，不要涉及美國人民。[132]後來陸志韋按此指示，改爲較爲緩和的聲明，並以陸志韋、鄧之誠、張東蓀、趙紫宸、翦伯贊、雷潔瓊等燕京大學暑期在校教職員 124 人聯名的名義，在 8 月 23 日的《人民日報》頭版上發表了譴責美國白皮書的宣言。[133]而且此次譴責宣言的聯名人數已經遠超燕大教師 1949 年 1 月發表對中共支持宣言時的 13 人，可見燕大教師對中共的態度也隨著局勢發展而不斷變化。

除了中國教師外，1948 年秋季學期時，燕大還有 40 多名外籍教師、家屬與留學生，其中美籍人員又佔大半。面對中共軍隊兵臨北平城下之勢，對於去留，據 1948 年 11 月 6 日《華北日報》稱：「校中美籍人士除少數年邁之教授奉令準備離平外，餘仍繼續任教。」[134]美國托事部給燕大的指示則說，美國人的去留由他們各個人自己決定，各差會決定不撤退他們所派的人。[135]當時英美駐北平領事館也通知在燕大的教員，如欲撤退，限 11 月底前登記，但多數人以在北平執教數十餘年，已發生深厚友誼，均不擬離去。[136]范天祥 1948 年底

131 項文惠，《廣博之師：陸志韋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 195。
132 K. Chen’s Report to Elisseeff and the HYI Trustees, February 15, 1950，轉引自樊書華著，方堃楊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頁 236。
133 原文參見〈燕大在校教職員聯名譴責美帝白皮書〉，《人民日報》，1949 年 8 月 23 日，第 1 版。
134 〈北大燕大決不搬家〉，《華北日報》，1948 年 11 月 6 日，第 5 版。
135 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宣傳部編印，《陸志韋檢討書》，頁 13。
136 〈燕大準備應變〉，《益世報》（天津版），1948 年 11 月 22 日，第 3 版。

時也稱：「共產黨口頭承諾會善待燕京大學。他們希望連一個人也不會離開，不管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他們只要求我們不要教導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我們傾向相信他們會遵守善待我們的諾言，但校裡整體還是傾向採取觀望態度。」[137] 雖然在燕大的外國人對中共的質疑更多，但在陸志韋等人的勸說下，也多數選擇留在燕大。在 1948 年 12 月，只有 6 名對共產主義感到恐懼的外籍教師離開了校園。[138]

燕大的外國人在中共接管北平後的地位如何，能否保證人身自由與安全，也是他們擔憂之事。從在燕大外國人的反應看，他們雖然厭惡國民黨統治，但最初對新接管北平的中共也存在疑慮。隨著與中共的接觸及對中共政策瞭解的加深，部分人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如在燕大工作的英國女教師貝盧思（Lucy M. Burtt）在 1949 年 1 月 10 日信中稱：「就目前情況看，私立教育機構會在新政權中佔有一席之地；外國人與外國資金在一定條件下會受到歡迎。」[139]當時很多美籍教師擔心因美國支持國民黨而受到中共的敵視，劉道生來燕大作報告時，特意提到要區分美帝國主義與美國人民，指出美籍教授對燕大教學做出貢獻，是我們很好的朋友，之後幾位美國教授還與他共進晚餐。[140]當然也有些外籍教師對中共並不信任，如美籍教師吳路義（Louis E. Wolferz）曾對西語系一位基督徒散播「共產黨來了殺人放火，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謠言。[141]因部分外籍教師回國導致師資缺乏，陸志韋還希望托事部繼續向燕大增派外籍教師。故在 1949 年 5 月，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托事部第四屆年會舉行時，美國托事部決定敦促與燕大有關的差會儘快填滿燕大教員的缺額，並希望當時在燕大人員延期退休，以便他們在此期間做更多工作，認爲把有經驗的西方人留在燕京

137 轉引自范燕生著，李駿康譯，《穎調致中華：范天祥傳——一位美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生命交流》，頁 240。

138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p. 222-223.

139 Lucy M. Burtt, 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January 10, 1949, p.4, UBCHEAYU, RG011-377-5736-0471.

140 董天民，〈燕園雜憶〉，《燕大文史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輯 1，頁 186。

141 〈揭露燕京美帝份子反對中國人民事實〉，《新燕京》，卷 2 期 19（1951 年 3 月），第 3 版。

很有價值。[142]但仍有留校外籍教師對新局勢感到不安，如在燕大工作多年的韋爾巽（Stanley D. Wilson）夫婦與博晨光（Lucius C. Porter）夫婦，在到退休時間到時，仍然於 1949 年暑期返回美國。

中共佔領北平西郊後，留校的外籍人員由於對中共外僑政策不瞭解，且與在國外的家屬失去聯繫，常有焦躁情緒，美籍人員的反應尤爲強烈。爲此，燕大校方在徵得中共當局同意後，在校內臨時安裝電臺，並於 12 月 22 日以陸志韋名義用英語廣播，稱中共佔領北平西郊後，燕大所有外籍員生均平安無恙，使他們在國外的親屬安心，也使在南京的各國使節知曉此情。[143]中共還同意美籍教師與美國駐北平領事館人員在燕大見面。當時中共仍然保護外人在華的合法利益，但在 1949 年 1 月 19 日發布指示要求在華的外國僑民，「在我解放區內，必須服從我人民政府法令，不得進行任何陰謀破壞和間諜活動」。[144]此指示也被用於燕大對外人的管理上。北平軍管會因局勢安全需要，在接管初期還限制外國人的行動。1949 年 2 月 17 日，范天祥在信中稱：「作爲西方人，我們的活動範圍被限制在校園內，而原因（他們說）是爲免我們遭受暴力對待，以及引起國際糾紛的可能。當然，我們全都被懷疑充當間諜。我們情願小心謹慎，並因而或多或少減少活動。」[145]這導致外籍人員入城困難。燕大地處西郊，日常生活多仰城內供應，爲此燕大校方於 1949 年 3 月 1 日致函北平軍管會，特請求爲該校美、英、蘇等國的教師、學生共 40 人申請辦理入城通行證，稱他們都爲純粹學人，後獲得軍管會同意，並令北平市人民政府外僑事務辦事處爲在燕大的外人辦理通行證。[146]3 月 9 日，美國駐北平領事在致美國國務院的

---

142 Minutes of the Fourth Annual Meeting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May 9th and 11th, 1949, 《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16。

143 “Communist Enter Peip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3, 1948, p. 20; 〈中共廣播外籍學生安全〉，《大公報》（香港版），1949 年 12 月 23 日，第 1 版。

144 〈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 年 1 月 19 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冊 26，頁 58。

145 轉引自范燕生著，李駿康譯，《穎調致中華：范天祥傳——一位美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生命交流》，頁 253。

146 〈有關處理燕大外僑事務的材料（1949 年）〉，《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15。

電文中還稱：在燕大的美國人已經不再被限制在校園中，但是中共建議他們不要前往西山地區，預計入城通行證很快就可以拿到。[147]3 月 15 日，燕大的外籍人員拿到了出入北平的通行證。

當時中共要求在平外人遵守政府法令，對外籍人員並不信任。如 1949 年 3 月，燕京大學黨支部曾對校內 21 名外籍教師的政治態度進行調查，把他們的政治態度列爲「進步」者不足 10%，「中間」者爲 23.3%，「反動」者則接近半數，佔 42.8%。至於另外 23.8%看不出明顯政治傾向的，則被列爲可疑人員。[148]即使爲在燕大的外國人辦理了通行證，但中共並未完全消除對其的防範。如 1949 年 8 月，夏仁德提到在燕大的外籍人員已經可以出入自由，但無法接觸到廣播，因爲有謠言說外國人有秘密的發射信號設備。[149]

在外籍教師對中共新政權的態度上，一些教師在親身經歷新環境後，改變了支援國民黨的立場，還有外籍教師表示了爲新中國服務的願望。如有燕大的美籍教授對《大公報》記者稱：「他和他的同事都冀望新當局有更多的指導，他說一切光明有望，是不成問題的。『告訴我們能做些什麼，使到對新社會的建立能夠有一點兒貢獻，我們一定全力以赴』。」[150]至於中共接管北平後對燕大的政策，還有外籍教師表示了認可，並稱：「新政府並沒有干涉學術與宗教自由，我們可以自我管理。而且燕大因有效使用資金受到政府肯定，並且建議燕大提供一個建設高等教育的計畫。燕大自身也希望制定出一個在新時代滿足青年需要的工作計畫。」[151]當然中共領導下的北平秩序也對燕大外籍教師形成

---

14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I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 1068.

148 燕京大學黨支部，〈燕京大學調查總結報告（調查材料之三）〉，1949 年 3 月，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1/10/130，轉引自楊奎松，〈一位美國傳教士在燕京大學的「解放」歲月——圍繞范天祥教授日記和書信而展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5 期，頁 40。

149 Central File Decimal File 893.00, Internal Affairs Of States, China, Political Affairs, August 18, 1949-September 19, 1949, MS China: Record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5-1949, 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 Washington, DC.

150 〈革命熱潮澎湃，學生們走出校園去參軍，教授們迎接時代改課程〉，《大公報》（香港版），1949 年 7 月 10 日，第 7 版。

151 "Campus Spirit is Good, Despite Political Shift," *Yenching News*, 27:2 (June 1949), pp. 1-2.

了挑戰，如范天祥在 1949 年 4 月信中稱：「我們都意識到，要想在當前局勢的體制內生存，就必須調整我們自己……我們現在對人生經歷的所有方面，包括食物、衣服、娛樂活動、生活標準、學習和預修的意圖、服務的準則和方式，都被迫進行再評估。」[152]當時部分外國人對中共接管北平後的部分政策表示不理解，但也有少數在燕大的外人提出：「不管外國人的某些評論如何正確，畢竟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是中國人的事，而不是少數外國人。」[153]

一些對中共比較支持的賴樸吾、夏仁德等外籍教師還介入了中共與英美的交往。如 1949 年 4 月下旬，中共軍隊在長江上與英國軍艦「紫石英號」發生衝突後，賴樸吾聯合燕大校內幾位英籍同事給英國政府寫信，指出「曲在英方」。[154]他還曾表示英國應將香港無條件歸還中國，並參加了 10 月 1 日下午的開國大典遊行活動。基於美國人對中共執政的憂慮，1949 年 8 月，夏仁德還寫了一份詳細介紹中共接管北平前後燕大情況的材料，解答當時外界關心諸如外人安全、宗教自由、未來走向等各種問題，並稱中共也強調由於缺乏管理經驗，也會犯些錯誤，不會進行激進的改革，通過其父於 9 月 2 日將此信轉給了美國國務院。[155]夏仁德夫婦也同燕大師生參加了 10 月 1 日下午的大遊行，並指出美國人應該認同這種看法，即：「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是否對我們過去在中國的政策表示遺憾……我們必須接受人民政府目前控制大部分中國的事實。」[156]

[152] Letter from Prof. Bliss Wiant to Dr. R. J. Mcmullen, April 3, 1949, p. 1, UBCHEAYU, RG011-377-5736-0494.

[153] 德克．博迪（Derke Bodde）著，洪菁耘、陸天華譯，《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1），頁 133。

[154] 賴樸吾教授紀念冊編委會編，《賴樸吾：中國的好朋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頁 28。

[155] Central File Decimal File 893.00, Internal Affairs of States, China, Political Affairs, August 18, 1949-September 19, 1949, MS China: Record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5-1949, 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 Washington, DC.

[156] "Randolph Clothier Sailer (1898-1981): Memory and Hope," 《夏仁德在中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頁 243。

（三）傳教士與基督徒的應對

燕大作爲教會大學，校內傳教士、基督徒眾多，有些中外籍教員也同時身兼傳教士、基督徒身分，這是其區別於其他國立、私立大學的鮮明特點。但是中共信仰的馬列主義堅持無神論，與基督教信仰產生直接的衝突，而且曾攻擊基督教爲帝國主義侵華工具，這是美國托事部及教會人士最爲擔心的問題。燕大到 1949 年 1 月初仍有 25 位傳教士活動，[157]而且還包括代理校長陸志韋在內的一批基督徒師生，如在 1949 年秋季學期的 1,000 名學生中，有信教男生 105 人，女生 83 人。[158]

在對傳教士的政策上，中共中央在 1949 年 1 月 19 日曾指示：「外國傳教士已在我解放地區者，容許其繼續居住，執行業務，新來者暫不批准。」[159]當時燕大校內傳教士雖然暫時很安全，享有宗教自由，但仍對未來充滿憂慮，對中共認識模糊，甚至有對立情緒。但也有在燕大的傳教士對未來充滿希望，有傳教士指出新政權對基督徒生活影響時稱：「可以激勵基督徒對基督教信仰和行爲的本質進行反思，並試圖呈現基督教的信息，使之充分應付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挑戰。同時，基督徒也意識到振興教會的必要性。」[160]從 1949 年燕大的情況看，傳教士仍然可以在燕大正常開展宗教活動。如 1949 年 8 月，有燕大傳教士報告稱：中共對於基督教活動沒有任何限制，禮拜及聚會仍然舉行。[161]但是傳教士也明顯感覺到新形勢對宗教活動的影響。因基督教曾被中共攻擊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范天祥在 1949 年 4 月的信中還特別提到：「現在我們需要改變以往傳教運動中體現出來的帝國主義傾向，因爲在目前的危機

---

157 "The North China Federation of Churches," *N. C. C News*, 2:6-7 (February-March 1949), p. 10.

158 〈燕京大學全校政治課總結及總結附件，1950 年〉，《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9034。

159 〈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 年 1 月 19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冊 26，頁 57。

160 "New Regime Inspires Review of Christian Faith, Conduct," *Yenching News*, 28:1 (November 1949), p. 2.

161 Stanley D. Wilson, Conditions at Yenching and in the Peiping Region, August 27, 1949, p. 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 East Asia Missions, Part 18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2001), Reel 386.

中，這嚴重困擾著傳教士們。」[162]再如 1949 年 5 月 21 日，在燕大西語系任教的傳教士白濟民（James H. Pyke）在信中說：由於校內青年團組織的阻撓，參加教堂儀式或其他宗教活動的人員急劇減少，但是還有一些人很勇敢且忠誠，特別是有 2 名男生堅持在復活節受洗入教。[163]中共一方面宣導宗教信仰自由，但又堅持無神論，這種看似衝突的政策，令很多傳教士與基督徒產生困惑。范天祥在 1949 年 9 月給美國友人信中還提到，受這種衝突的影響，很多基督徒青年公開宣稱放棄了基督教信仰，他們在反對基督教方面或是中立，或是激進，並且提到了在中共黨員中仍有不少基督徒。[164]

對中共接管北平的反應，燕大校內基督徒大多持迎接挑戰，改造自己的態度。有少數基督徒對新局勢持悲觀心態，對中共持質疑態度，當時爲宗教學院學生的楊安鼎對於燕大基督徒內部心態曾描述：「特別在教會內由於解放前夕部分外國傳教士散布了不少歪曲共產黨的宣傳，使得許多不明眞相的人惶惶不可終日，唯恐解放了，共產黨來了，教會將遭受『逼迫』。因此在當時的革命浪潮中基督教界飄搖不定、不知所從。」[165]有些對新局勢持樂觀態度，堅持留在燕大的基督徒，則想通過爲中國及民眾的眞誠服務，向新政權證明燕大和基督教的價値，並展示基督教生活的新意義。[166]對於共產主義的挑戰，還有一些燕大宗教學院的中國教師認爲：「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在理想上不無共通之點。這兩項世界潮流，既然不能彼此永久迴避，只有謀求共存之道。基督教在歐美已受資本主義毒素浸染甚深，在中國則無此先入爲主之弊病。所以中國正是試驗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共存構想的適當所在。」[167]此類想法是當時基督徒中對現狀比較積極的一派。還有校內對基督教有興趣的學生，在新環境下發生了動

162 Dwight W. Edwards, *Yenching University*, p. 429.
163 The Letter from James H. Pyke to Frank T. Cartwright, May 21, 1949, p. 2, Missionary Files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1912-1949, China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9), Reel 63.
164 China Letter, September 1949, p. 3, UBCHEAYU, RG011-377-5736-0545.
165 楊安鼎，〈懷念我的老師趙紫宸先生〉，《天風》，1988 年第 4 期，頁 17。
166 Dwight W. Edwards, *Yenching University*, p. 421.
167 梅貽寶，《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頁 93。

搖，有一些學生因信仰基督教而拒絕加入黨團組織，但也有學生爲加入黨團組織而放棄基督教信仰，不再信仰上帝而信仰共產主義。如美國女教師包貴思（Grace M. Boynton）在 7 月 29 日的信中提到，一名燕大女生爲了加入了共產黨，轉而脫離了宗教，並且她還說已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義。[168]這種在基督教信仰與共產主義信仰之間的搖擺或抉擇，也是當時燕大校內基督徒面臨的必然問題。

作爲宗教學院院長的趙紫宸則對新局勢抱樂觀態度，對中共態度也從質疑到支持。[169]他在 1949 年 1 月 27 日寫給友人的信中提到：「我們燕大的師生面對『解放』的現實都很愉悅。其中有些對中共有懷疑的人也被給予足夠機會離開燕大，現在他們在其他地方很安全。儘管我們絕不是共產主義者，但留下的人仍有理由對革命力量的成功表示歡欣。」[170]對於基督教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他在 1949 年 2 月 1 日的報告中認爲：基督徒和共產黨之間可以建立暫時協議。現在基督徒中有共產黨，在共產黨中也有基督徒。所以問題不是共產黨將會怎樣對待基督徒，而是基督徒怎樣去對待共產黨。[171]對於共產主義對基督教的挑戰，他在 1949 年 6 月發表的英文文章〈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教會〉則提到：「公開『思想的衝突』尚未尖銳化。它在最近的將來或許不致發生，但是至終必會臨到。在身體方面大概不會有甚麼迫害，然而教會必要遭遇一種難以形容的刺激。」[172]在經歷中共執政一段期間後，趙紫宸在 1949 年 6 月 1 日致蔡詠春的信中稱：「去年 11 月有不少人建議我們遷到別的地方去，我抵制了這建議，現在看來我是完全正確的，因爲在中國哪一個地方沒有解放呢？任何

168 Grace M. Boynton's Letter, July 29, 1949, p. 2, UBCHEAYU, RG011-321-4909-0660.

169 關於趙紫宸在 1949 年前後的思想變化及應變，可參見古愛華（Winfried Glüer）著，鄧肇明譯，《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8）；梁家麟，〈無能者的無能：1949 至 1951 年的趙紫宸〉，《建道學刊》，期 9（1998 年 1 月），頁 69-101；邢福增，《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香港：建道神學院，2003）等論著的相關論述。

170 T. C. Chao, "Days of Rejoicing in China," *The Christian Century*, 66:9 (March 2, 1949), p. 265.

171 T. C. Chao, Revolution in China, February 1, 1949, p. 4, 《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50074。

172 趙紫宸著，馬景全譯述，〈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教會〉，《希望月刊》，卷 21 期 9（1949 年 9 月），頁 10。

逃跑的企圖都是對基督教的不忠實。」[173]1949 年 9 月的美國《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雜誌上，還刊登了趙紫宸的〈六個月後的紅色北平〉一文。該文介紹了中共執政北平後對基督教的政策，肯定中共當局對教會活動繼續表示支持與認可，指出基督教的新變化，並認爲中國仍需要傳教士的存在，並提及燕京大學宗教教育並沒有受到干涉。[174]趙氏認爲中共所領導的革命是上帝對中國教會的審判，教會若不利用這審判而努力改造自己，復興起來，便將死去。他對中共執政表示歡欣，對人民政權的建立有堅強信念，不但自己領頭，並且號召各教會人員學習新政治形勢下的各項問題。[175]他的這些舉動被守舊的教會人士認爲思想左傾。趙紫宸在回憶燕大宗教學院的文章中表露了他在 1949 年時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我要爲基督盡忠心，而逐漸感覺到自己並沒有抓到宗教的實際，雖然我已是一個客觀唯心論者。另一方面我早已下定決心接受新政權的領導，決不做反對政府的任何事情……無論我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如何，新政府總比蔣政權要好得多。」[176]

結　語

燕京大學在 1949 年經歷了新舊政權轉移，校內發生了許多新時代的變化。校方管理、課程改革、人事、財務等各方面都出現了調適，既有與其他大學一樣加強政治教育，也有自己的特殊性。美國托事部對於燕大校內諸多新變革並不認同，但在當時中共執政的大環境下，燕大只能順勢而爲，加速本土化改造，這也符合中共對教會學校的改造目標及教會學校中國化的整體趨勢。美國托事部雖然無力干涉中共在燕大的各項變革，但其一直強調的宗教自由、學

173 〈趙紫宸致蔡詠春的信（1949 年 6 月 1 日）〉，《燕京大學檔案》，檔號 YJ1944009。

174 T. C. Chao, “Red Peiping After Six Months,” *The Christian Century*, 66:37 (September 14, 1949), pp. 1066-1068.

175 《北平教會概況（1949 年）》，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100-001-01023。

176 趙紫宸，〈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4），輯 43，頁 128。

術自由問題，在 1949 年的燕大仍然得到了保證。與同處北平的輔仁大學相比，燕大在此期間的遭遇相對平穩，並且受到了中共當局的肯定。燕大在當時處於中共、美方兩方管理的尷尬處境和矛盾狀態，校方試圖維護舊有的辦學傳統，但也必須執行中共的有關政策。不可忽視的是，陸志韋對中共的態度也是逐步變化，從最初的觀望到之後的支持，積極向新政權靠攏，爲燕大的後續變革提供了組織保證。作爲美方代表的范天祥則明顯反對燕大的本土化，特別是政治化的改造，但在與中方的權力交鋒中，雖然最初仍能把持校政，但到下半年已被校務委員會架空，陸志韋的話語權大爲增加。

1949 年間，如何處理教會大學問題是中共城市政權建設管理的重要課題，因涉及外國、基督教的雙重背景，出於穩定中外關係及自身經驗不足的考慮，中共對燕大等教會大學並沒有直接接管，而是在維持現狀，允許其繼續使用外國經費的前提下，對其進行了新民主主義的改造，體現出政策的靈活性。中共當局在保持對美關係中的獨立自主及高等教育改造基本方針的前提下，與美方、燕大互相適應，根據形勢的變化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政策。因燕大當時情況頗爲複雜，中共、燕大校方及美方都有各自的期許，但在各自政策的實際博奕中，總有一方存在心理的落差，而美國托事部的失望最大。在中共執掌政權的背景下，由於陸志韋爲首的中方教職員傾向中共，使美國托事部預想的很多政策在燕大無法落實。中共由於初爲執政黨，很多政策都在摸索進行，對燕大等教會大學暫時維持現狀的政策，是其在對新佔領城市的管理過程中，基於教會大學特殊性所作出的過渡性政策，也是一種作爲執政黨的高等教育管理新探索，且隨著形勢的變化逐漸增強對教會大學的管理權。

在新舊政權的更替及學校改造的過程中，燕大師生在此期間的心路歷程非常矛盾掙扎，這也是 1949 年鼎革之際高校師生的普遍心態。多數燕大的中國師生從最初對中共疑慮，到隨著新民主主義學習的進行及親身經歷新環境後，對中共又抱有希望，開始積極參與建設新中國的各項活動。當然燕大師生群體內部的反應也不盡相同，不能一概以進步教師與共黨團員那樣擁護支持共產黨

而論，不能否認仍然有師生對共產主義有不同看法，在燕大的外國人及基督徒的質疑明顯更多。1949 年的燕大校內師生情緒是當時知識分子思想的眞實寫照，也爲中共當局所掌握，更爲 1951 年的知識分子大規模思想改造埋下伏筆。當時中共在校園內推行的諸多新政，引起部分師生特別是外籍教師的不滿，但仍無力改變大局，中共初步實現了在燕大開展新民主主義教育的計畫。

鼎革之際的燕大校園內出現的諸多新變化，充滿主動與被動的各種抉擇，也爲之後中共對該校的各種改造提供了便利。中共的反帝立場及堅持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允許燕京大學等教會大學長期存在下去，但保持社會穩定，平穩過渡符合中共及其他各方的利益，所以才出現三方短暫時間的博奕。因此，燕大由外國經費資助，雖然在 1949 年暫時得以維持，但不可能被強調獨立自主的中共新政權一直接受，而且基督教的價值觀與中共的共產主義理念存在本質的差異。同時，在博奕過程中出現的中美雙方關於經費及宗教問題的矛盾，雖然暫時得到解決，但隨著中共在外交上宣布傾向蘇聯的「一邊倒」的政策，特別是 1950 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這些衝突因而公開化。從 1950 年下半年開始，隨著朝鮮半島引發的國際局勢變化，中共公開出兵援助朝鮮導致中美關係惡化，中共已不允許教會學校接受美國的津貼且進行宗教宣傳。故在 1951 年 2 月，燕京大學改爲公立，美國教會津貼被迫宣告中止，隨後在 1952 年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燕京大學被解散，結束了三十多年的辦學歷史。[177]

[177] 關於燕京大學末期的歷史，可參見：楊奎松，〈燕京大學的最後兩年〉，《中國新聞週刊》，2016 年第 24 期，頁 73-77。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蔣中正電傳作義〉（1948 年 12 月 17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300-00197-213。

《北平教會概況（1949）》，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100-001-01023。

《燕京大學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紀念特刊》，北京，19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冊 2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北京大學檔案館藏，《燕京大學檔案》，1949-1950。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解放（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

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等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集 1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鄧之誠著，鄧瑞整理，《鄧之誠日記》，冊 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宣傳部編印，《陸志韋檢討書》，北京，1952。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enching University,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 East Asia Missions, Part 18,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2001, Reel 386.

Missionary Files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ary Files Correspondence, 1912-1949, China,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9, Reel 63.

Record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5-1949, 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I,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二、報刊

China Colleges, 1949.

N. C. C News, 1949.

The Christian Century, 1949.

Yenching News, 1949.

《人民日報》，1949-1950。

《大公報》（上海版、香港版），1948-1949。

《中國青年》，1949。
《北平解放報》，1949。
《申報》，1948。
《恩友團契月刊》，1949。
《消息》，1949-1950。
《益世報》天津版，1948。
《華北日報》，1948-1949。
《進步日報》，1949。
《新燕京》，1949-1950。
《燕京社會科學》，1949。

三、回憶資料、文史資料

〈陸志韋傳〉編寫小組，〈陸志韋傳〉，收入《文史資料選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輯 40，頁 1-69。
《夏仁德在中國》編輯組編，《夏仁德在中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編，《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北京，2006。
江平口述，陳夏紅整理，《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范燕生（Allen Artz Wiant）著，李駿康譯，《穎調致中華：范天祥傳——一位美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
夏自強著，鄭必俊編，《一生的燕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倪艮山，《沉思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
梅貽寶，《大學教育五十年：八十自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
葉祖孚，〈難忘的 1949 年〉，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的黎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頁 259-267。
楊正彥主編，《雄哉！壯哉！燕京大學 1949-1951 級校友紀念刊》，北京：燕京大學校友會，1994。
趙紫宸，〈燕京大學的宗教學院〉，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4，輯 43，頁 106-128。
燕大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輯 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燕大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輯 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賴樸吾教授紀念冊編委會編，《賴樸吾：中國的好朋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四、專著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卷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王效挺、黃文一主編，《戰鬥的歷程：燕京大學地下黨概況（1925-1949.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

古愛華（Winfried Glüer）著，鄧肇明譯，《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8。

左玉河，《張東蓀傳》，北京：紅旗出版社，2009。

邢福增，《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香港：建道神學院，2003。

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郝時遠、羅賢佑主編，《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張瑋瑛、王百強等主編，《燕京大學史稿》，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9。

陳遠，《燕京大學（1919-1952）》，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傑西．格．盧茨（Jessie Gregory Lutz）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項文惠，《廣博之師：陸志韋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劉建平，《紅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基督教、天主教的政策演變及其影響（1949-1955）》，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有限公司，2012。

德克．博迪（Derke Bodde）著，洪菁耘、陸天華譯，《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1。

樊書華著，方堃楊譯，《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Bickers, Robert. 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2017.

Edwards, Dwight W.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9.

Lapwood, Ralph and Nancy.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tchworth, Herts: Garden City Press Ltd., 1954.

West, Philip.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五、論文及專文

邢福增，〈連根拔起：建國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的終結〉，《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增訂版）》，香港：道風書社，2012，頁 153-216。

周紹昌，〈緬懷陸志韋校長〉，收入王大鵬主編，《北京大學校友憶往錄：夢縈未名湖》，煙臺：黃海數字出版社，2014，頁 88-93。

張世龍，〈燕園破曉前〉，收入《在第二條戰線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頁 240-251。
張建梅，〈新中國成立初期對燕京大學的接管與改造〉，《北京黨史》，2016 年第 2 期，頁 44-47。
張建梅，〈新中國成立前後燕京大學外籍教師的去留抉擇〉，《上海黨史與黨建》，2018 年 5 月號，頁 39-42。
梁家麟，〈無能者的無能：1949 至 1951 年的趙紫宸〉，《建道學刊》，期 9，1998 年 1 月，頁 69-101。
陳永齡，〈南苑華美莊調查〉，《燕京社會科學》，卷 2，1949 年 10 月，頁 119-304。
楊奎松，〈一位美國傳教士在燕京大學的「解放」歲月——圍繞范天祥教授日記和書信而展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5 期，頁 30-52。
楊奎松，〈燕京大學的最後兩年〉，《中國新聞週刊》，2016 年第 24 期，頁 73-77。
劉建平，〈1950 年「輔仁大學事件」歷史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頁 55-67。
賴樸吾（Ralph Lapwood）著，晨鋒譯，〈一位外國人目睹的北平解放〉，《北京黨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頁 83-87。

Gamesmanship and Regime Shift: The Multiple Faces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1949

Zhang Deming*

Abstract

With the shift of national power from the Kuomintang to the Communist regime, Yenching University, its Board of Trustees in Americ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layed a game around the management of school affairs in 1949. Most of Yenching's teachers and students chose to stay in Peiping. The CCP adopted a policy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provide certain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allow Yenching University to continue to use fund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us Yenching's teaching atmosphere could be maintained as normal, and it enjoyed academic freedom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taff represented by Lu Zhiwei (Luh Chih-wei) and Bliss M. Wiant engaged a power struggle, but finally the new school affairs committee was set up, and the Chinese side gained actual control. Most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Yenching University supported the CCP, but some stayed on the sidelines and thought that academia had little to do with politics. Missionaries and Christians at Yenching University had doubts about the CCP's adherence to atheism, but they were actively seeking integration with the new era. The many changes at Yenching University in 1949 came about through active and passive choices. The CCP, the Board of Trustees in America, and Yenching University also adjusted and adapted in time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re were many twists and turns, especially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n the issues of funding and religion. The future of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foreshadowe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Keywords: **Yenching University, Lu Zhiwei (Luh Chih-wei), Board of Trustees in America, Christianit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

* Institute of History The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